

活在江户时代的朱子学——以《白鹿洞揭示》为例

陈博恺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十分重视朱子学, 并将其作为官学。当前已有不少研究对在江户时代背景下推行朱子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讨论, 但缺乏结合朱熹著作的先例。由此本文着重于对朱熹所著且在日本被广泛注解的《白鹿洞揭示》进行逐条解读, 由此分析朱子学的核心内容, 并结合江户时代“宗教信仰”、“时局变化”、“阶级形态”三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进而论证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推行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朱子学; 白鹿洞揭示; 江户时代

中图分类号: B313.3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吸取众多儒家先辈的思想后加以理解精炼, 成为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不仅对中国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还通过文化交流传播至日本。理学在日本发生获得接受并发生流变后, 逐渐成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朱子学”, 并在江户时代被作为官学推行至各地, 进而得以普及。值得一提的是, 江户时代的统治者是以幕府为首的武家政权, 却将朱子学这一儒家学说视为正学。此外, 在日本兴盛已久的佛教就此被朱子学所替代。朱子学对江户时代到底有何意义, 便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

对于以上问题, 在学界早已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关于其先行研究,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首先, 基于江户时代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 其大体内容主要围绕江户幕府的体制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展开, 如川上周三(2015)等; 另一方面, 以朱子学的自身特征为出发点, 主要探讨朱子学的核心内容及教育理念, 并与其他学说加以对照, 进而证明其与江户时代的契合性, 如小柳司气太(1928), 中弘仁(1985)等; 此外, 将上述两种考察视角结合并进行考察的先行研究也不在少数, 如岩田卫(1901), 平塚益德(1937)等。

尽管如此, 上述先行研究中, 并未出现通过分析朱熹所著作品进而说明朱子学与江户时代相契合的情况。朱子学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流入日本的过程想必是通过作为媒介的作品或学者完成的。因而本文在探讨朱子学与江户时代的契合性时, 将结合朱熹所著代表作之一——《白鹿洞揭示》, 通过对揭示内容的逐条分析, 尝试论证朱子学能在日本江户时代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

二、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

朱子学自传入日本以来, 直至成为江户时代幕府所推崇的官学为止, 期间长达数百年。最初, 朱子学仅仅是作为盛行一时的佛学的附属品, 与其一同传入日本, 在日本国内的传播也多依托于佛学。之后, 通过精通朱子学的学者们的努力, 朱子学逐渐脱离了佛学, 由此获得了独立。因此, 在众先行研究中, 多是将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附属于佛学和从佛学中脱离的两个阶段。此外, 作为日本朱子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 日本早期儒学的发展自然需要加以重视。因此, 在本文中, 将日本朱子学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早期儒学的发展历程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 自古以来多有文化交流, 而作为中国传统主流学说的儒学便在交流

过程中传入了日本。早在隋唐时期与日本形成正式的文化传播渠道之前，中国已有部分儒学典籍流传到了日本。根据传入的时间及方式，当前有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东渡蓬莱、《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的后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赐物倭奴、《古事纪》记载的西晋太康六年（285年）百济王仁携书访日等多种说法。由于相关史料薄弱，在此不做过多讨论。但也由此可知，早在日本得以统一之前，已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儒学文化的影响。推古天皇八年（600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访问中国，此举宣告日本开始正式学习中国文化，一时两国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也是日本儒学文化兴盛的开端。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臣的活动一直延续至宽平六年（894年），最终由于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势衰弱、遣使海路艰险等原因而被废止。这些受遣的日本使臣在中国长期生活，於此期间不断学习隋唐的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先进文化，并在学成之后归国。不少遣唐使回国后受以重用，直接影响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人。在此过程中，日本效仿唐朝对自身的体制及文化加以改革。佛学与儒学由此成为了统治者的政治武器，在当时制定的律令《养老令》中不难看到中国儒学经典的身影。在平安时期，形成了与唐朝国子监相仿的大学寮制度，寮内以传播及研究儒学文化为主。通过中日早期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儒学土壤，对于之后朱子学的传播而言十分重要。

（二）附属于佛学的朱子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宋朝佛教盛行，日本有大量僧侣远渡重洋前往中国，试图学习各个佛学流派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僧侣也纷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传教之旅。之后在日本盛行一时的禅宗及净土宗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得以传播的不仅仅是佛教经典，包含儒学书籍在内的各式文物皆由此渠道传至日本。此时当权的镰仓幕府崇尚武士道精神，这与禅宗的内核不谋而合，因而儒学在此阶段只能以佛学附属品的姿态留存于世。随着之后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圆尔辨圆为首的僧侣开始推行佛儒一致的思想，而兰溪道隆及一山一宁等得道高僧均对此说表示赞同，但世间主流思想仍是佛学。直至室町幕府时代，日本的朱子学终于由传入迈向了研究阶段。即使是后醍醐天皇也开始提倡当时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并企图借此从幕府手中夺回政权。此外，在当时众多研究朱子学的群体中，最为知名的便是五山禅僧。尽管他们对朱子学钻研颇深，却未能从佛学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因而当时的朱子学仍无法被作为独立的学说，仅是推行佛学的附属品。

（三）从佛学中脱离的朱子学的发展历程

在五山禅宗的时代之后，尚从属于禅宗的儒学被分为了博士公卿、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三大流派。这些流派在当时均依存于各地的政权，因而能够自由地发展自身的学说。在此过程中，武家的统治阶层逐渐意识到朱子学在治理封建社会方面的实用性，因而开始将其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此时中国的明朝政权崩塌，以朱舜水为首的众多儒者因对清朝不满而流亡日本。在日本进行儒学传教的朱舜水，不断主张振兴儒学，这一举措对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后，通过藤原惺窝等儒学学者的努力，朱子学在传入日本数百年后的江户时代，终于得以从佛学中脱离，以原本的姿态出现在日本社会中。最后，以儒学者林罗山为德川幕府重用为契机，朱子学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江户时代，其普及程度及发展阶段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关于《白鹿洞揭示》

《白鹿洞揭示》由朱熹创作于1180年，是位于中国江西省的白鹿洞书院的校规。从内容上来看，《白鹿洞揭示》全篇通俗易懂，全长仅数百字，皆为朱熹从儒家先哲所著经典中选取的至理名言，并将其用更为简洁明了的话语表达。《白鹿洞揭示》中所蕴含的核心思想是朱熹的理学思想，而此揭示也可以看作朱熹毕生学术思想的成熟结晶。^[1]《白鹿洞揭示》在被创作后，其内容被不少后世书院所认同，或直接或经修改后被它们使用。创作于宋朝的《白鹿洞揭示》，即使是在元朝以后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是在学术思想上与朱熹意见相左的王阳明，对《白鹿洞揭示》的内容却是深表赞同，称“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足矣”。^[2]由此可见，《白鹿洞揭示》问世后在中国影响巨大。

前文已述，在江户时代朱子学之所以能够迎来其全盛时期，与侍奉德川幕府并受以重用的儒学者林罗山的个人努力有巨大的关联。林罗山将德川家康所推行的政策称为王道，而当时的王道实际上便是朱子学的德治主义。^[3]此外，林罗山获得德川家康的许可，在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在位时建立起自己的私塾——林家塾。而林家塾，便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幕府官学昌平坂学问所的前身。尽管林家塾被称为私塾，但却有官费生在其中就学，且其涉及到建造均有官方参与，实际上在一开始便具有半官半私的性质。在昌平坂学问所中，规定于每月十五日的上午九点半开始举行名为“御座敷讲积”的讲学活动，活动的实际内容便是对《白鹿洞揭示》的内容进行梳理讲解。此举开创了昌平坂学问所内以一年为周期进行讲学活动的先河。此外，在当时日本著名的乡校——闲谷学校中，也有类似的习俗，并且延续至今。山崎闇斋及中江藤树等江户时代杰出的日本儒学者也均十分重视《白鹿洞揭示》，付出大量时间在对其的研究上。^[4]由此可见，《白鹿洞揭示》的内容不仅受到了中国书院及各时期学者的认同，也在江户时代对日本的朱子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通过对《白鹿洞揭示》内容的综合分析，或许能窥探出探究江户时代幕府推行朱子学作为官学的根本原因。

在接下来的第四章中，笔者将对《白鹿洞揭示》的内容进行逐条解读，并基于江户时代在各方面的时代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求找出江户时代朱子学被作为官学的根本原因。

四、从《白鹿洞揭示》看朱子学与江户时代

《白鹿洞揭示》全文只有数百字，从结构上能够分为作为正文的条规及其创作原因两个部分。条规部分十分简洁明了，全文仅有五条，分别从各个角度叙述了朱熹的教育理念及其对人行举止的个人看法。而从其创作原因部分不难看出，朱熹当时是为了为白鹿洞书院定下合适的培养目标而完成了《白鹿洞揭示》。但实际上来看，揭示中所含的内容不仅适用于书院的儒学教育，也成为了此后封建社会用以巩固内核的理论基础。接下来，我们将对五条学规进行逐一解读，并结合江户时代在“宗教信仰”、“时局变化”、“阶级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时代特征，论证推行朱子学对江户时代作为统治者的幕府的意义所在。

（一）从“宗教信仰”看朱子学的适用性

揭示第一条内容：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1]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2] 王守仁 著; 王晓昕、赵平略 点校. 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七 文录四序记说·紫阳书院集序[M]. 中华书局, 2015.

[3] 吉田太郎. 昌平校における歴史教育の研究[J]. 横浜国立大学教育紀要, 1964(4): 41-57.

[4] 柴田笃, 杜娟.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2): 6-9.

揭示第一条解释：

父与子之间应该存在亲情，君与臣之间应该存在道义，夫妇之间存在内外区别，长幼之间存在尊卑次序，朋友之间应该诚信。做人应该重视这些伦理道德。

揭示的第一条强调了作为父母要慈爱、作为子女要孝顺、作为君王要仁爱、作为为臣子要忠义、夫妻间内外顺从、长幼间尊卑有序、朋友间相互诚信。这一部分主要强调了朱子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所谓“性”，可以理解为常说的“心”或是“本质”。而“本然之性”，则如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自然法则（所以然的原因），所以父母应该爱护自己的子女便变成了伦理道德（所以然的结果），换言之其中蕴含了纯粹的“理”。^[1]并且，朱熹所主张的是“理前气后”，既强调为了让人能把握并回归其内在的“理”，必须把握作为外在表现的“气”。换言之，仁义礼智信作为人之五常，是只有我们主观地进行内省，并同时客观地观察万物后，才能够具备的真理。而揭示的第一条所叙述的，便是朱子学的这一教育理念。

从内容上不难看出，朱子学所推崇的伦理道德将依存于社会上的人进行排序，存在于下位的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存在于上位的人民，而这正好与推行封建主义的幕府所谋求的理论高度一致。而与之相对的是，早在公元六世纪便开始繁荣于日本社会的佛学，而其在这一方面，与朱子学的理论大相径庭。根据当时的佛教经典《勝鬘經義疏》可以看出佛学所提倡的是，人自出生以来，便是地位平等，拥有自己的权力与价值，以自利利他为人生目标生存于世。^[2]此外，当时的天皇推行神佛一致，主张自己并非人类而是神明的后代，同时还是拯救众生的菩萨。^[3]由此，历任天皇以此为解释，成功实现了在众生平等的前提下，维系自身政权的目的。而在朱子学尚未兴盛于日本的上千年间，以天皇为首的统治者一直借助佛教的这一思想对人民加以束缚，从而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方针。既然如此，为何在江户时代官学由佛学变更为朱子学，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解释说明了。首先，在当时被视为神明的天皇只是政治傀儡，拥有实权的是处于社会阶层顶层的幕府大将军。因此，原本佛教所强调的众生平等论已不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而取而代之的朱子学，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白鹿洞揭示》第一条内容一样，强调人民的先后次序，这十分符合当时幕府的统治理念。另一方面，自奈良及镰仓时代开始便欣欣向荣的佛教，在拥有大量权力的同时，内部也滋生了腐败。当时的佛教注重形式，为大量的制度所舒服，僧侣无法进行自由自在的学术研究。以至于大量的僧侣无德无能，每日仅为满足自身的贪欲度日。在足利时代，这一情况更为严重，各大寺庙的僧侣相互争夺势力范围，破坏戒律，引起民愤，一时废佛思想四起。以至于在江户时代，佛教思想对于庶民而言其信服力大减，已无法作为限制百姓的工具。因此，正如《白鹿洞揭示》第一条所示重视伦理道德的朱子学才在江户时代得以兴盛，成功取代佛学，成为德川幕府加固自身政权的重要工具。

（二）从“时局变化”看朱子学的适用性

揭示第二条内容：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揭示第二条解释：

广泛地开展学习，详细地进行请教，勤勉地保持思考，明确地做出辨别，忠实地处理事

[1] 中弘仁。「日本の朱子学受容」の概論-1-[J]. 国士館大学政経論叢. 1985(53):147-165.

[2] 朱谦之. 日本哲学史[M]. 人民出版社. 2002.

[3] 東海林克也. 神仏習合の歴史展開[J]. 21世紀社会テ`サ`イン研究. 2013 (12):103-108.

物。学习应当重视这些次序。

揭示的第二条强调了学习知识的顺序，既“穷天理”的具体方法。早在朱子学出现以前，儒学便已历经了长达数千年的发展，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儒学从原本重视伦理道德的学说，逐渐演变为统治者有力的政治手段。为了谋求社会地位，不求真知实学而只是囫囵吞枣般地强记典籍的儒学学者不在少数。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追求儒学，早已脱离本质而成为了士大夫们追名逐利的工具。朱熹由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为加以改善而提出了自己对于学习的理解，即揭示第二条的内容。朱子学作为当时的新儒学，相较之前的各类学说，将揭示第一条所述的人伦五常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强调对真理的探究便是达此目的的唯一方法。^[1]真理的探究，便是学习的本质，也即朱子学所强调的结合实际情况来把握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并将其运用于更多的实践中。

朱熹早年前往福州任职时，曾对当地教育情况进行考察，并发出“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此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土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2]的感慨，不难看出朱熹认为要实现社会的安定，教育的兴盛必不可少的个人主张。^[3]而揭示第二条所述的学习方法，作为宋代书院的学规主要面向于接受私学教育的平民百姓，可见朱子学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学说，这也与朱熹的主张一致。江户时代由德川幕府所统治，是日本最后的封建时代。而江户时代之前应仁之乱的数百年间，全国各地征伐不断，仅靠五山僧侣艰难维系着各类学说的发展。公元十七世纪初，在德川家康的强力手腕下，战火终于得以平息。尽管如此，德川家康深知若不强化庶民的封建思想，难以维持封建社会的长久安定的事实。因此，德川幕府为更好地统治庶民，在限制其武力以外，不得不施以文治。而在此时，精通朱子学的藤原惺窝、林罗山师徒二人所推行的“穷天理、明人伦”这一治世方法便得到了德川家康的认可。江户时代的儒学教育，较之前朝，最为成功的便是其对象的广泛性，不仅面向贵族同时还重视庶民，这是之前仅面向统治阶级的神学或佛学所难以实现的。正因如此，朱子学得以成为与幕府统治相契合的官方学说，以教育的形式为维系江户时代的社会治安做出贡献。

（三）从“阶级形态”看朱子学的适用性

揭示第三、四、五条的内容：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揭示第三、四、五条的解释：

为人应该言辞忠实可信，行为正直恭敬，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愤怒，纠正自己的过错以求向善。将此作为磨练品格的目标。处事不应该为了个人利益和功名，而应该端正是非，坚持正义。将此作为处理事情的态度。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应该强求别人来做；如果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就应该反过检查自己。将此作为对待别人的方法。

尽管这三条学规各有所论，但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可以说涵盖了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即“明人伦”的具体方法。三条学规的共通点之一，便是其强调集体的正义，并将其优先于个人的情感或需求。也就是说，人应该做到无视自己的苦难和自由，而重视对全社会

[1] 朱玲莉.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J]. 齐鲁学刊, 2011(05): 31-35.

[2] 祝穆撰; 祝洙增订; 施和金点校. 方輿胜览·卷之十 福建路·福州·学校[M]. 中华书局, 2003.

[3] 角田多加雄. 朱子学派教育論の歴史の展開[J]. 哲學, 1989(89): 143-162.

的贡献。尽管在教育方面，朱子学重视实学并主张全民教育，但与当时其他的学说一样，并未能够脱离封建主义的大框架，以至于仍存留了为封建思想服务的一面。

江户时代为了实现封建社会的稳定，施行了众多政策。一方面推行了完善的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将所统治的领土分发给各地大名，以大名完全服从幕府为前提实现了对全国国土的中央统治。因此，幕府与各藩便形成了相互依存而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在各地推行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各司其职且无法逾越阶层鸿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位于食物链顶层的德川幕府支配着其他阶层，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由，尽可能地满足武士们的个人利益。这些封建体制，在给支配者带来利益的同时，给予了下层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此外，十七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各地生产力突飞猛进，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商人阶级拥有了干涉社会顶层的武士的经济实力。总而言之，在江户时代欣欣向荣的外表下，掩藏着巨大到阶级矛盾。^[1]为维持社会的安定，作为统治者的德川幕府，必须对人民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干涉。当时的政策将社会划分为有用军事能力的武士阶层和禁止武力的其他阶层，尽可能地在行为上限制了反动的发生。尽管如此，还需要对庶民的思想加以干涉。正如前文所述教育文化的复兴有益于社会的安定，但自由的思想却可能成为封建社会崩塌的导火索。因此，正如揭示后三条学规所示，朱子学主张社会的利益优先于个人的需求，在束缚江户时代庶民思想上意义重大，而这也是它被作为官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白鹿洞揭示》的内容进行逐条分析，结合江户时代“宗教信仰”、“时局变化”、“阶级形态”三个方面的时代特征，论证了江户时代幕府将朱子学作为官学的主要原因：首先，朱子学重视人伦道德及阶级制度，相较于佛教所推崇的众生平等，更适用于江户时代以“士农工商”这一阶级划分方式为前提的封建体制；其次，朱子学推崇格物致知，提倡追求真理，这对于偃武兴文并谋求社会安定的江户时代而言意义重大；最后，朱子学强调人在修身处事等各方面需要不断自我反省，为了社会的发展应该舍弃个人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封建压迫性，能够进一步强化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在思想上的束缚。由此，朱子学被日本江户时代的幕府统治者视为正学并推行长达近三个世纪。

参考文献

- [1] 朱谦之. 日本的朱子学[M]. 人民出版社. 2000.
- [2] 朱谦之. 日本哲学史[M]. 人民出版社. 2002.
- [3]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 川上周三. 幕末社会变动の国際歴史社会学的研究(上)[J]. 専修人間科学論集, 社会学篇, 2015(5): 11-33.

- [4] 吉田太郎. 昌平校における歴史教育の研究[J]. 横浜国立大学教育紀要, 1964(4): 41-57.
- [5] 中弘仁. 「日本の朱子学受容」の概論-1-[J]. 国士館大学政経論叢. 1985(53):147-165.
- [6] 角田多加雄. 朱子学派教育論の歴史的展開[J]. 哲学. 1989(89):143-162.
- [7] 柴田笃, 杜娟.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戸儒学[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2):6-9.
- [8] 朱玲莉.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J]. 齐鲁学刊, 2011(05):31-35.
- [9] 東海林克也. 神仏習合の歴史展開[J]. 21世紀社会テ`サ`イン研究. 2013(12):103-108.
- [10] 川上周三. 幕末社会変動の国際歴史社会学的研究(上)[J]. 専修人間科学論集. 社会学篇. 2015(5):11-33.

Neo-confucianism Living in the Edo Period—Taking "Bailudong academy revelation" as an example

Chen Bok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Edo period, the Tokugawa shogunate in Japa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Neo-confucianism and regarded it as an official doctrine at that time. At present, many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out Neo-confuci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do period, but there is a lack of precedent combining Zhu Xi's work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Bailudong academy revelation" written by Zhu Xi and widely annotated in Japan, and analyzes the core content of Neo-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ligious belief", "situation change" and "class form" in the Edo period, and then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ism being carried out in the Edo period.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Bailudong academy revelation; Edo period

作者简介: 陈博恺, 男, 江西樟树人,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日本文化。